

东野圭吾推理小说的人心拯救

◎ 廖芝林 刘毅青

摘要：自松本清张开创社会派以来，日本推理小说家们的作品逐渐向揭露社会现实、拯救世道人心方向发展。以东野圭吾为代表的当代推理小说家的作品中，对推理情节进行淡化，仅借用推理的方式呈现社会现实，其之所以广受赞誉，除了满足了读者对推理小说的阅读期待以外，还在于其中所展现出来的文学教化意义，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反省自身，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精神的疗救。本文以东野圭吾为例，从个体完整性的构建、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呼唤、对现实社会中世道人心的拯救三个方面分析指出，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具有的美育诉求，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推理小说的美育功能，这对中国通俗小说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东野圭吾 社会派推理小说 人心拯救

日本推理小说史上派别纷呈，有侧重谜团设计的本格派、擅长营造气氛的悬疑派、恐怖血腥的变格派、专注剖析现实人性的社会派等，各派别之间以其独有的特点占据读者市场。从读者接受与社会影响的角度看当代日本推理小说界各派别之间的发展，“社会派”独占鳌头。

一、社会派推理小说的“两起两落”

在松本清张开创社会派之前，本格推理小说占据主流位置。而由本格推理小说发展而来的变格派推理小说也是大受欢迎。这两个流派的推理小说，除了解谜这一核心外，往往都会加入神魔鬼怪的元素，通过制造恐怖的氛围吸引读者的眼球。在那个时代，推理小说多以《××杀人事件》《××谋杀案》为题。从这些略带恐怖色彩的题目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推理小说注重的是解谜所带来的快感。20世纪50年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诸多社会弊病也日渐暴露出来。对此有着深切体会的松本清张，毅然将创作方向从案件谜团设计转向关注社会现实，他认为，罪恶的根源来自病态的社会。基于这样一种观念，松本清张将文学与现实结合起来，这就使得推理小说有了更深刻的社会意义。社会派推理小说自开创之初至今历经两次大起大落，松本清张的《点与线》《砂器》《零的焦点》三部代表作陆续推出，六七十年代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一枝独秀，因松本清张的个人成就，那个时代的推理小说甚至被后人称为“松本清张”时代。1992年随着松本清张的去世，社会派推理小说一枝独秀的时代也宣告终结，继而被八九十年代兴

起的“新本格派”取代。

社会派推理小说是在二战后的背景下对社会现实与人性展开的剖析，而 20 世纪 80 年代后的日本，社会环境较为安定、经济发展处于稳定增长时期。首先，民众全心投入于美好生活的创建与维护，整个社会呈现出来的面貌较为积极，社会派以揭露社会、剖析人性为主要内容的创作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其次，除却对同一类型小说的审美疲劳外，20 世纪 80 年代推理小说的主力读者成长于社会稳定发展的六七十年代，他们没有经历战争的残酷，没有体验过战后的艰辛重建，无法与社会派推理小说中的创作背景与故事内容产生更多的共鸣。因此，推理小说回归到解谜的快感、智力的较量上来成为大众所趋，本格回归的潮流占据日本推理小说界的主流位置也在意料之中。时间来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本格回归潮流日渐兴盛，以岛田庄司、绫辻行人为代表的推理小说家们开创了“新本格派”。

新本格派的时代一直持续到 21 世纪初，然而经济高速发展的日本社会，表面繁荣，实际上暗流涌动。人性、家庭伦理、社会环境逐渐受到侵蚀，纯粹的新本格派推理作品中也慢慢融入了新的元素，以东野圭吾为代表的日本当代推理小说家，他们的作品创作从谜团设计转向对世间冷暖、人性善恶的关注。在科学理性与智能工具大行其道的时代，推理小说家们选择将逻辑推理、谜团设计移置于幕后，对完善人性、家庭伦理以及美好社会的呼唤逐渐成为创作主旨。正是这种创作方向的转变，使得推理小说的读者群日趋扩大，并使其逐渐脱离通俗小说的场域，成为更具思想性、价值性的作品。这种将本格推理与现实结合起来的创作流派被称为“新社会派”，也因为东野圭吾、凑佳苗、宫部美雪等一批优秀作家的创作发展，使得由“社会派”小说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社会派”重新占领推理小说界的高地。

从作品畅销程度与接受传播的角度看，“新社会派”推理小说家中以东野圭吾的成就最大。东野圭吾凭借 1985 年的《放学后》、1999 年的《秘密》、2006 年《嫌疑人 X 的献身》三部作品立足于日本推理小说界。有感于社会中人性异化与自我的丧失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社会矛盾，东野圭吾企图借助推理小说的方式来恢复完善的个体性，并继而重构起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家庭、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纽带。从他的作品中，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对人性扭曲的刻画、对崩溃的伦理观念的描写、对社会冷漠与黑暗的控诉，实际上是利用这种反衬的方式让读者直面最真实的现实环境，从而内省自身进而观照身边的家庭及社会现状，实现其审美教化功能：个体完整性的构建、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呼唤、对现实社会中世道人心的拯救。因此，以东野圭吾为代表的新社会派推理小说家们的作品具有十分丰富的美育价值。

二、东野圭吾作品中的美育诉求

东野圭吾早期的创作多属于本格派，偏重谜团设计与逻辑推理。这一时期的作品内容以犯罪描写为主，较多涉及传统本格小说中的密室、童谣、密码等元素，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放学后》《毕业前杀人游戏》《以眨眼干杯》等。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极速

滑坡,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之下,东野圭吾开始“寓谜团于社会现实”,以东京、大阪两座现代化大都市为背景,将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案件经过艺术处理后融入小说内容。将创作重点放置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与情感之上,以“强烈的情感冲突”体现“人性”。21世纪以来,东野圭吾故事的重心渐渐转移,与之前的推理小说不同,他开始淡化谜团,淡化凶手的身份,把重点放在“犯罪动机”上,不仅呈现个体性的异化,还将个体性异化造成的家庭问题作为其创作重点。2002年出版的《湖畔》、2006年出版的《红手指》就是如此,揭露凶杀案背后隐藏的动机以及批判日本社会家庭及教育方面存在的扭曲现象是创作的主要目的。2010年之后,东野圭吾的作品开始转向对世道人心的治愈与关怀,以《解忧杂货店》为代表,这个阶段的作品虽然仍然关注日本民众复杂多变的人性,但更多地侧重于人性从丧失到回归的救赎,进而在救赎中对现代人起到治愈心灵的作用。

(一)“完整的个体性”构建

东野圭吾作品中描写的人物大多处于自我迷失的状态。《白夜行》中的女主人公唐泽雪穗,小学时期就被母亲出卖肉体以换取金钱。因过于年幼无力反抗,所以她只能屈从于大人的魔掌。对她来说“性”就是灵魂,所以当肉体一次又一次地被出卖之后,她变成了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将“性”当作生命的核心价值实际上是对自我人格的极度迷失,在她一生中,凡是其道路上的阻碍她都利用这种方式来摧毁。唐泽雪穗的分裂在于,内心对安全的极度渴望威逼着她向上走,而童年时期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折磨又一直将她拉下地狱,在向上与向下的撕裂之中,她用最卑劣的手段来攫取内心的渴望。她的分裂掩盖在其光鲜外表的伪装之下,所以即便是人情练达之人筱冢一成也只能隐约说出其内心的直觉“那是更危险的光,可以说是隐含了卑劣下流的光”^①。《白夜行》中,东野圭吾没有一上来就告诉读者谁是凶手,也没有对任何角色有过刻意的偏袒,只是通过第三人的叙述,在探寻案件缘由的过程中向读者揭露越来越冰冷的现实。即使在最后时刻,他也没有安排雪穗被抓获的情节,仅仅通过对其背影的描写给读者内心留下一抹苍凉。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东野圭吾认为雪穗是黑暗现实的受害者,不给他安排拘留的结局就是对其处境的极度同情。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当中直面世间晦暗不堪的同时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合上书本,留给读者的思考或许是:如果雪穗如平常人家的孩子一样长大,凭借聪慧、美貌,她一样可以走到今天,但是现实的残酷不允许这个如果的存在,一个完整的人格是需要完整的爱与家庭中建构起来的,这是雪穗带给读者的启示。除此之外,“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表达了一种理想,那就是慰藉卑微者饱受死亡威胁的心灵。这种理想属于所有对生命困境有真切感受的人类个体”^②,他们通过雪穗、亮司等人的经历观照自身处境,于黑暗的现实感受到一丝抚慰的光亮,并通过阅读作品过程中产生的共鸣得到精神上的净化进而趋向更完善的个体性塑造。

如果说雪穗的迷失与分裂是因为黑暗现实的迫害,那么人性内部的异化才是最直击人心的。《恶意》中杀人凶手野野口修嘴中的一句“我就是看他不爽”而引发的案件让人不寒而栗,野野口修就像是一条阴冷的蛇,面对有知遇之恩的同窗好友日高,因为内心的嫉妒与恨意,他不仅要将其杀害,甚至要毁掉他的声誉。这所有的一切都源自内心的异化:

痛恨自己,把憎恨引导到别人身上,在他人痛苦中获得快乐,恨不知所起,深入骨髓,便是最冷的人性。当野野口修的真实面目一层又一层地被揭露在读者面前时,读者看到的是基于身份不对等、灵魂不对等的人性之恶。东野圭吾通过《恶意》让读者看到人性的分裂面,看到自己内心最不堪的妄想,野野口修的伪善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读者内心深处正在滋长的或已经形成的恶意。人的个体性完善除了天生的基因之外,还有后天对未来和更完善自我的追寻。对完整个体性的构建,在东野圭吾的《秘密》这本小说中体现得更为集中,原本自由美好的灵魂被囚禁在了家庭琐事之中,当灵魂住进了女儿的身体中,对自由的渴望,对梦想的追求重新点燃了直子的激情。无论是出于复仇的谋划还是解除丈夫精神上的困囿,直子最终的选择实际上是对更完善自我的追寻。东野圭吾通过推理小说的方式告诉读者,人性的完整,个体内部的构建是基础,成长于后天环境的培养,完善于内心对向上、向善的追求。东野圭吾的小说中对个体人性异化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同情或是憎厌,仅仅通过平淡的叙述告诉读者事件的缘由,让读者在接受故事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受到其价值观的浸染,从而实现自我本性的回归与灵魂的救赎。

(二) 寻求维系传统家庭伦理之道

时间来到 21 世纪,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相比,21 世纪的日本经济所有好转,但仍然受泡沫经济引发的后遗症影响,成长于经济低迷、现代化迅速发展下的日本主力家庭开始感到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已是力不从心。2001 年,日本终身雇佣制受到冲击,依靠男性一人收入支撑的家庭开始面临新一轮的经济压力。经济社会不景气加上职场用工制度的调整,让日本男性毫无喘息之机,他们疲于奔命,无暇顾及家庭和维系与孩子的教育,孩子的成长缺乏父亲的参与,老人的晚年没有儿子的宽慰,为生计奔波、害怕裁员的恐惧让他们成为资本市场的劳动机器。东野圭吾在这一阶段的创作就是看到了在此环境背后所隐藏的家庭矛盾与教育问题,“在日渐严重的高龄化社会,如何与高龄者、年少者相处,如何建设一个亲情不再缺失的社会,正是作品给我们的强烈启示”^③。

开始连载于 1999 年的《白夜行》,其创作核心在于黑暗现实下人性的扭曲与异化,除了对人性异化的震撼之外,读者还看到了由此产生的对伦理定位与伦理责任的漠视。女主角唐泽雪穗的母亲,因生活困窘选择出卖自己女儿的身体以换取生存。在她的脑海中,生存与母女情之间的博弈,本能的欲望成了她行为的驱使,当理智被欲望本能占据之后,所谓人性便开始让位,基于人性之上的伦理责任也消失无踪。男主人公桐原亮司的父亲,痴迷对幼女的畸形癖好让他漠视家庭,而他的母亲,因丈夫有恋童癖出轨于家里的帮工,并当着儿子的面与帮工发生私情。当至爱至亲变成了魔鬼时,年幼的他们根本无力反抗,只能联手杀人去获取自己想象中的温暖。东野圭吾通过对两个孩子成长环境的刻画来分析其长大后罪恶行为,并借此提出父母及家庭教育才是形成孩子行为性格的第一因素。因家庭、父母而导致的孩子犯罪问题,在东野圭吾 2002 年创作的小说《湖畔》中有了更为集中的阐述。一名补习教师和四对各自带着孩子的夫妇于城外度假别墅内参加考前集训,家长之一俊介的情人于深夜尾随而至但惨遭杀害,于是几个家庭合力弃尸,隐瞒这件杀人案。根据作案现场是孩子杀了人,但是无法断定是四个孩子中的哪一个杀了人。当

案件逐渐露出马脚,层层谎言背后的事实一次次挑战人伦底线。为了让孩子挤进名校,家长们用金钱、甚至肉体贿赂老师以获得真题。为了达成利益结盟,家长们举办嗑药派对、玩换妻游戏;丈夫在外私养情妇,妻子与他人调情享乐。东野圭吾将日本精英阶层乍看身镶光环、温文尔雅的外包装一一撕开,露出其伪善、软弱、色厉内荏的真面目,父母对子女的信任、夫妻之间的忠贞、传统的伦理观念全被人性的自私、低劣、变态所替代。经济至上的日本社会,存在着高压态的竞争,由成人蔓延到儿童,父母打着爱的旗号干尽人间丑事,父慈子孝的表象之下,丑恶人性在暗中涌动。传统家庭伦理纲常已从内部崩坏,像蛀虫一般慢慢侵蚀,当中产家庭这个阶层被腐蚀之后,日本社会人性的架构也渐成危楼。所以《湖畔》中的四个家庭,他们宁愿选择一起来隐瞒,像齿轮一样环环紧扣,每个人都不敢松懈。湖水的平静和清澈象征着孩子的纯真无邪,当大人们把尸体沉埋于湖中,也把自己的灵魂埋葬,从此良心泯灭。尸体会慢慢把湖水污染,也预示着失去了灵魂的大人终究会将孩子们毒害成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小说中,没有刑警、没有审问,也没有缜密的案件推理,开放式的结局暗示着东野圭吾自身的疑问,如何维系传统的家庭伦理观?至此东野圭吾并没有提出,只在小说的最后给予读者一丝温情,继子对俊介的关心与需要使他放弃报警选择一起隐瞒这次的谋杀案件。

对传统家庭伦理的重构,寻找维系家庭的方法道路上,东野圭吾在2006年出版的《红手指》中传达了一种“以爱赎爱”的救赎之道,即以父母对子女的“天性之爱”救赎因黑暗现实下走失的“人性之爱”。田原昭夫为了掩盖未成年儿子杀人的罪行,嫁祸给自己老年痴呆的母亲田原政惠,却不知母亲是假装老年痴呆。政惠为了让儿子迷途知返,通过各种旁敲侧击的方式试图唤醒儿子,直到最后一刻,当昭夫回想起幼时母亲对自己无私的爱与付出时才幡然醒悟自己犯下的罪过。过度溺爱让一个15岁的孩子漠视生命随手杀害,天性母爱唤醒了良心走失的儿子并在最后关头完成了对这个家庭的救赎,这便是东野圭吾通过作品寻找到的“以爱赎爱”之道。当“人性之爱”在颓靡的环境下走失、畸形、黑暗,那么最纯粹的“天性之爱”便是找回它的最佳路径。“以爱赎爱”的表现方式在《红手指》中还通过爱的对立面——恨的形式,来进行表达,刑警加贺恭一郎看似与父亲之间有着至死不相见的恨意,实际上是对父亲人生遗憾的弥补,加贺恭一郎的母亲流落在外独自面对死亡的凄冷是加贺父亲心底至死难以弥补的遗憾,只有感同身受的痛苦才能完成自己对妻子亏欠的救赎。

(三) 社会人心的治愈

进入21世纪,日本社会长期的经济低迷导致中产阶级的家庭面临更大的经济问题,其家庭内部矛盾日益凸显。此时人性分裂与迷失蔓延各阶层,社会人心日益冷漠。无论是《白夜行》《嫌疑犯X的献身》,还是《湖畔》《红手指》都已经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社会人心进行了全面剖析。东野圭吾深知,社会的黑暗已人尽皆知,深入剖析下去只是在不断挑战人的接受底线。但是如何才能让大家醒悟并且回归到善良、完整的人性呢?这成为他在2010年之后创作的主要方向。只有人心得以治愈,社会的环境才能和谐美好,2014年出版《解忧杂货店》便是其创作理念的具体实践。

《解忧杂货店》围绕几个平凡人的困境展开：“因男友身患绝症，在爱情和梦想之间徘徊的击剑选手静子；为了音乐梦想离家漂泊，却在现实中寸步难行的鱼店音乐人克朗；父亲债台高筑，不得已举家逃亡，挣扎在亲情与未来迷茫中的浩介；从小被亲戚收养，长大欲报恩缓解养父母经济压力的陪酒小姐晴美——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向浪矢杂货店投递了咨询信，并在牛奶箱里得到了答案”^④。杂货店的主人浪矢雄治是东野笔下善的化身，他和他的杂货店历经岁月洗礼，心怀最大的善意为来信咨询的人做好回答。《解忧杂货店》采用超现实的写作手法，以倒叙的方式、时空交错的方法将故事串联，所有来杂货店咨询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丸光园”孤儿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本读完之后读者才幡然醒悟，孤儿院的创始人是浪矢雄志年轻时爱慕的对象创建的，解忧杂货店主人浪矢雄志对“丸光园”求助者们的回信，弥补了浪矢雄志与爱人相爱而不得的遗憾并以此方式守护他们的爱意，浪矢雄志也正是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这便是这部小说最大的魅力所在，在帮助他人找回内心所丢失的东西同时，填补着自我内心的空白，达到人性的救赎与自救。《解忧杂货店》被称为东野圭吾的创作转折点，案件推理已经完全退居幕后，逐渐转型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创作风格日渐成型的同时逐渐形成了其作品的教化功能。除了对普世人心的治愈以外，东野圭吾的作品中犯罪动机已经从原来的伦理责任的缺失、爱的畸形转向了弘扬父母子女之爱的深情，如2016年出版的《祈祷落幕时》，无论是身患抑郁症的母亲担心无法照顾儿子的田岛百合子，还是为了女儿的声誉一直隐姓埋名的浅居忠雄，都向读者展示了这世间至真至纯的父母的爱和对子女的情。两个为了子女而拼尽一生的中年人彼此扶持度过一段段阴郁的日子，一起守望子女的成长构成了他们生存的全部意义。因为子女还没有彻底收获幸福与成功，所以他们还要继续坚持，当子女真正站在人生的巅峰时，两人便犹如蜡烛一样，燃烧了最后一厘米，之后便陷入了永恒的黑暗之中。

无论是父母之爱子女为其幸福舍弃自我，还是子女对父母之深爱内化其中，东野圭吾都是站在人伦之爱的角度上来刻画，让冷漠社会感受到纯粹爱意的温暖；假如社会中千千万万家庭都被父母子女之爱包围，假如社会中你我都能在陌生人身上找到杂货店的温暖，那么人心便得以治愈而社会也将变得和谐美好。

三、推理小说的美育转向及对通俗小说的创作启示

社会派推理小说虽然历经“两起两落”的发展趋势，但是于今日推理小说场域仍然占领高地在于其抓住了读者的审美要点，寄意蕴于故事叙述之中，并融入创作者的美育倾向，让读者阅读过后能从中获得阅读快感，再体会到其中的美育内涵。在社会现实的大背景下进行创作，将谜团设计悬置，从犯罪动机的角度出发，挖掘其中隐藏黑暗人性，并由此对家庭、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是社会派推理小说惯常的创作手法，而由揭露社会黑暗到拯救世道人心的转变是其近年来整个社会派推理小说家的创作转向，通过描写人心的关怀、人性的治愈达到对世道人心的拯救。让读者在获得审美感受的同时能反省自身，进而对完整个体性、家庭伦理、社会和谐建构起到积极作用。

(一) 新社会派推理小说创造转变的原因

以东野圭吾为代表的“新社会派”推理小说家们的创作方向从现实的揭露逐渐转向世道人心的拯救。

首先,表现在以往的现实揭露集中在对政界、商场风云的刻画,如今他们将创作视点转向了平凡人的爱恨喜怒。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当代社会的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受过现代教育的完善洗礼,不是具有独立意识的社会精英,没有足够的力量无视他人与世界,他们被动善良、尊重传统伦理,却被迫生活在一个人口流动频繁、资本迅速积累、技术创新日新月异的利益时代,他们在巨大压力的推搡下艰难前行,即使拼尽全力,来对抗社会现实对自身的异化,结局往往是苦涩艰难甚至毁灭性的。日本当代社会派推理小说家们意识到民众所处的环境、意识到整个社会意识结构的崩塌源于一个又一个被腐蚀的个体灵魂的堆砌,所以只有将这些民众的生活、所遭受的苦难、精神上的破灭一一揭露,才能让更多生活在同样环境下的人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同样,在创作中,以爱与温暖将小人物的的心灵得到治愈,作为社会民众精神上的一剂良药,让他们深知自己才是内因,敢于谴责自身心性不坚、消极懈怠,这种反省意识和自我归因使他们成为真正人格独立的、有尊严意识的现代人,进而整个日本社会才会达到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部分到集体的治愈。

其次,新社会派推理小说家们的创作转变还将创作视点集中在对青少年犯罪的问题之上。“近年来,日本未成年犯罪案件数量激增,1992—2002年日本校园暴力案件增加了两倍。因此2001年日本把刑事起诉年龄从16岁降至14岁”^⑤。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未来,其身心发育是否完善与社会的良性发展息息相关,新社会派推理小说家们意识到了培育“下一代”的重要性,也深切感知到社会大背景下教育制度、学校环境存在的各种弊病对孩子身心健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将青少年犯罪问题这一社会现象作为创作视点是推理小说家们社会责任感的体现。柏拉图认为必须从幼年起就对人施行严格的教育,这是因为,“一个儿童从小受了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融入了他的灵魂深处,在那里牢牢地生了根,他就会变得温文有礼;如果受了坏的教育,结果就会相反。再者,一个受过适当教育的儿童,对于人工作品或自然物的缺点也最敏感,因而对丑恶的东西会非常反感,对优美的东西会非常赞赏,感受其鼓舞,并从中汲取营养,使自己的心灵成长得既美且善”^⑥。以创作的方式呈现社会环境下青少年异化的心理历程,揭露其异化背后的家庭、教育、环境问题,除了东野圭吾外,日本当代新社会派女性推理小说家凑佳苗的作品中也屡有涉及,《告白》中两个联手杀人的初中生,一个因为母亲的溺爱与父爱的缺失让他漠视生命,另一个因为对母爱的极度渴望而视生命于无物。《为N》中唯利是图的父亲,无法自立的母亲,都是对青少年犯罪案件背后的问题揭示。新社会派推理小说家们让读者在扭曲、丑恶的对立面反思现状,从而重视实际存在的问题,这是社会派推理小说家们创作转变的又一美育价值。

最后,日本当代推理小说家们由社会现实的揭露转向对世道人心的治愈与拯救并不仅仅集中在对“平凡人的爱恨喜怒”与“青少年犯罪”这两个视点,只是说从这两个角度更能引起读者群体的共鸣,从而传达出作者的美育倾向,实现其小说的教化功能。德国美学

家席勒把希腊人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视作完美人性的楷模,认为“他们既有丰满的形式,又有丰富的内容;既能从事哲学思考,又能创作艺术;既温柔又充满力量。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想象的青年性和理想的成年性结合成的一种完美的人性”^⑦,思想家们把完美的人性作为审美教育的最高理性,同样作为推理小说家们,也将完美人性的塑造作为其创作的历史使命,从而达到更好的个体性、家庭以及社会。从黑暗现实的揭露到世道人心的拯救,既是社会派推理小说家门立足于当下社会现实的创作转变,也是推理小说家们社会责任感的具体体现,早年东野曾在访谈中谈道:“人性的独白、社会的炎凉,这些是人类永远需要关注的命题。”^⑧

(二) “疗救”作用对国内通俗小说的启示

快节奏的生活与繁杂的日常事务,使人忽视自我反省致使内部世界日渐荒芜;日趋激烈的竞争与互联网带来的生活方式,使人与人之间失去应有的联系和关爱而疏远冷漠。在此现实背景下,日本推理小说家们肩挑社会责任,寓教化于喜闻乐见的作品创作,以故事叙述的方式疗治人心,使推理小说逐渐区别于通俗小说而更具有深刻性与价值性,这是国内通俗小说应该学习的价值点。通俗小说的创作也应该以深厚的社会历史作为背景,融入社会现实,凸显“个体救赎”“社会治愈”,涵括多重主题,以此来充实丰富自身的思想内容与审美意蕴。以东野圭吾的创作为例,他的作品虽然被定义为“推理小说”,但是在创作中挣脱了体裁的枷锁,化思想内涵于故事情节当中,通过故事的叙述、情节的推进来达到其美育价值。

以揭露人性的《恶意》与家庭伦理的《红手指》为例,对罪犯的追查是两部作品情节的主线,并给案件的发展带来了推动力。《恶意》中,开篇不久,作品中的刑警就已经破案,告知读者杀人凶手是死者的好友,并将其缉拿归案。而《红手指》中,更是在一开篇就将作案的凶手、动机以及犯案过程悉数告知读者,主人公田原昭夫年仅 15 岁的儿子对女童求爱不成将其杀害,并由他和妻子将作案现场转移。在这两部作品中,读者一开始就知道凶手是谁,并没有体会到推理小说特有的悬念,那么吸引读者的究竟是什么?事实上,随着作者叙述的不断推进,凶手的作案动机以及隐藏在案件背后的真相才是真正吸引读者的地方。《恶意》中的野野口修为了隐瞒内心真正的动机,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查案陷阱,使案件进展屡次中断。好友的事业、家庭、品性,每一样都是他不曾拥有却十分嫉恨的,癌细胞的侵蚀使他将剩余的生命全部投注于对好友的报复计划中,一旦计划成功,好友的形象将会被他取而代之,机关算尽却难逃刑警加贺恭一郎的追查,直到最后真相大白。野野口修在作品中全心筹谋,而读者却在作品之外以旁观者的方式看着他从嫉妒到仇恨到算计直到枉费心机,野野口修最终的失败,在读者看来不过是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印证,读者获得的是野野口修在不同阶段、不同角度上呈现出来的人性之恶,这种视角上的差异使作品产生了悲剧反讽的浪漫主义色彩。在《红手指》中,对凶手的追寻虽然没有悬念,但是田原昭夫与妻子合谋毁灭犯罪现场、蓄意嫁祸给有老年痴呆的母亲这一过程使读者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此外,田原夫妇对罪犯儿子的溺爱与对母亲的利用形成鲜明对比,借此将社会中父母与子女以及家庭之间的矛盾一一揭示,这使读者对“父慈子孝”的传统

伦理观念也受到了冲击。对父母的爱、对子女的情、对家庭伦理的维系才是作品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读者与作者一起通过案件的推进、情节的发展寻求一条维系传统家庭伦理的道路。因此,我们说“东野圭吾小说的最大魅力不是在于它的社会意义,而是它对于读者个人的意义。我们很难在他的书中找到他对于现实社会的批判,他更多的是用精彩的小说打动读者,教会读者如何去生活,如何去思考”^⑩。

在推理小说中,对读者来说看似神秘的答案,比如凶手、犯案过程等,一开始就呈现在读者面前,在这个方面他并没有满足读者对该体裁的阅读期待,但是在情节的推进当中,案件背后的动机、人性的复杂面却给读者带来了不同于传统推理小说给予的好奇,是一种对神秘的解答,关乎于社会的阴暗、人性复杂以及对拯救人性的探寻,从这个角度来看,推理小说的发展只在于创作内涵的丰富与转变,并没有跳脱学界对推理小说给定的视域。以东野圭吾为代表的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家们,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来写小说,收集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并在创作中寄寓美育内涵,以此期待构建自己理想中的人性与社会。东野圭吾、凑佳苗、宫部美雪等一批当代“新社会派”推理小说家们,他们的作品多次刷新出版印刷史奇迹、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作品大受好评,这是新社会派推理小说创作转向成功的最佳凭证。从揭露到救赎,让纷杂社会中灵魂迷失的现代人感受到世间温情,在喜闻乐见的传播中让读者领会到文学作品的美育价值,进而观照自身塑造一个更完善的自我个体,从而完善家庭、创造和谐美好的社会。

(三)“美育”转向的不足之处

推理小说是一种反映犯罪的文学,涉及对人性之恶、人性复杂的刻画,比其他小说更能揭示人性的阴暗面。当艺术抛弃了表象,艺术就成了一种寻找自身可能性或本质的责任,以东野圭吾为代表的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家们的作品,跳出传统推理小说的套路,在叙述与情节上创新,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或惊讶、或怜悯,以极度的剖析与揭露或至善至爱的洗礼给读者带来心灵的震撼和审美的享受,作品内涵与审美理想的寄寓成为其创作本质。

以犯罪现场展开故事叙述的推理小说,每一个案件背后都堆叠着人间悲剧,如《红手指》中家长对孩子教育失败导致的命案、《虚无的十字架》中两个初中生因意外怀孕,将孩子生下来杀死从而用一生来救赎,而《祈祷落幕时》的原罪不过是经济纠纷,已足以将女主人公博美一家逼入绝境。生活在21世纪的社会中,“悲剧”已经不是历史作品中的命运不公,上天注定,寻常人彼此面对的日常问题,都足以演化出大同小异的人间悲剧。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能够借助于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之情来使人们的灵魂得到净化与陶冶,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悲剧主人公遭受到的痛苦并不是由于他的罪恶,而是由于他的某种过失和弱点,因此他的遭遇就会引起我们的同情和怜悯”^⑪。《白夜行》中唐泽雪穗之所以会变成白夜行走的幽灵,其本身可以说是无罪的,是成长过程中遭受的迫害形成了她漠视法理而以诡计掠夺所需的价值观,在经济至上,利益为先的大背景之下,人人都有可能经历雪穗的童年,雪穗也因为童年被伤害的经历了才导致她一生的毁灭。因此,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对她的态度是,憎恨中仍不失一丝怜悯。以东野圭吾为代表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家

们的作品,之所以能引起读者的审美享受在于,作者把将人间悲剧以推理小说的形式呈现,在对人性分裂、社会黑暗和死亡书写的过程中,既能通过对苦难和创伤的悲剧性呈现,使读者产生怜悯、恐惧等不同的情感,又能通过对悲剧性人物的抗争行为、超越精神的描绘,发掘小说的悲剧美,使读者正视现实,观照自身,思考自我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这毫无疑问给读者带来心灵的震撼和审美的享受。正如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怜悯的对象是遭受了不该遭受之不幸的人,而恐慌的产生是因为不幸者是和我们一样的人”^①。

悲剧的作用:“一是凭借悲剧激起的怜悯与恐惧,促发观众内在的情感宣泄;二是凭借这种情感宣泄,使人获得心理解脱或审美满足;三是通过悲剧所表现的崇高理想、伦理道德,使人获得心灵净化。”^②以东野圭吾为代表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家们的创作转向,从揭露到疗救仅仅停留在悲剧作用的第二层,使读者获得审美满足,并没有将其美育价值发挥到极致。推理小说要想实现其美育价值,必须达到精神上的净化。而以东野圭吾为代表的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家们的创作转向,由揭露现实、剖析人性到世道人心的拯救这一转变,对于其想要达到的美育目的来说,只能是暂缓疼痛的止痛剂,并不是最佳的疗效选择。如《解忧杂货店》中,杂货店店主浪矢雄志心怀最大的善意回复来信求助之人,一丝善念促使三个因偷盗而误闯入杂货店的少年以“浪矢杂货店”的名义回信,少年抢劫犯在回复过去人的来信中,也救赎了自己。在看惯了人性分裂迷失、人伦纲常崩坏的社会现状后,读者从《解忧杂货店》中感受到的是人性的善良与真诚,除了获得一丝慰藉之外,作品中作者没有提出、读者也没有找到如何拯救人性的道路。同样在《祈祷落幕时》中,令读者感动的是案件背后抑郁症母亲对儿子的爱与愚弱父亲对女儿的守护,然而横亘在这种大爱面前的人性悖论、社会不公却一直存在。掩卷深思,创作方向的转变使读者在黑暗中寻到幽丝光亮,然而如何拯救、如何治愈人性仍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因此,推理小说要实现其美育价值,须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找准人性迷失、分裂、异化的着力点,精准剖析,对人性异化背后不合理的制度进行鞭挞,对黑暗的现实进行揭露,只有找准病态人性背后的症结,才能找到人性的救赎之道,真正拯救人性,否则,所谓“治愈”与“疗救”只能是恶症的缓解,治标不治本。

另外,以推理小说的方式来承载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与美育理想在社会接受的过程中也具有较为明显的局限性。首先,在于“在当前的日本文学研究中,大众文学虽然得到重视,但从数量及质量上却远逊于日本纯文学作品研究”^③。其次,推理小说毕竟受众范围较小,虽然近年来在读者群体中有日益火爆的趋势,但也是建立在能接受推理小说、爱看推理小说的读者群体之上,其他大众文学形式,如言情、科幻等作品也分流了一部分读者,推理小说注定无法做到经典化、普世化。

注释:

① [日]东野圭吾:《白夜行》,刘姿君译,南海出版公司《白夜行》2013年版,第167页。

② 钟翔:《论东野圭吾作品中的死亡书写》,2012年湘潭大学硕士论文。

③④ 张景一:《论东野圭吾作品中的新社会派特性》,《海外文坛·当代文坛》2014年第4期,第92-95页。

- ④ 查依帆:《在人生的岔路口不再迷茫——评东野圭吾〈解忧杂货店〉》,《出版广角》2017年23期,第89-90页。
- ⑤ 张磊:《日本未成年犯罪问题初探》,《辽宁警专学报》2006年第1期,第64-68页。
- ⑥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8页。
- ⑦ [德]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9页。
- ⑧ 王燕君:《解读东野圭吾经典社会派推理作品——〈红手指〉》,《北方文学:中》2012年第10期,第61页。
- ⑩ 朱立元:《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180页。
- ⑪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郝久新译,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2007年版。
- ⑫ 徐熹:《论悲剧对人的净化和审美距离的作用》,《艺术科技》2016年04期,第243页。
- ⑬ 李德纯:《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文艺评论》1985年第1期,第96-98页。

(廖芝林,南昌大学文艺学在读硕士研究生;刘毅青,男,70后,江西人,文学博士后,南昌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中外文学)